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唐宋诗选

管士光 杜贵晨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唐 宋 诗 选

管士光 杜贵晨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宋诗选 / 管士光等选注.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 唐... II . 管... III . ①唐诗—选集②古典诗歌
—作品集—中国—宋代 IV . 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13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唐宋诗选

管士光 杜贵晨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25 印张 278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 - 80680 - 175 - 8 / I·094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 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 炯 傅璇琮

主 编 乔 力

副主编 邵 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岗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够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灿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从唐朝立国(618年)到南宋亡于元蒙(1279年)的约六个半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这期间,唐代疆域广大,曾经创造了古代无与伦比的盛世;然而唐以后,经过五代(907—960年)的更迭,北、南宋不仅始终未能完全统一中国,反而先后亡于来自北方的金、元。当唐代盛时,即布衣之士,“仰天大笑出门去”,不难想到立功绝域,置身卿相;而到了宋朝,士大夫们的浪漫至多不过“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陆游语)。因此,这期间历史的变化,不止于表面上的“强唐弱宋”,还在于精神气格、文化风习及心理的迥然不同。这种差异在诗歌方面的表现,就是严羽《沧浪诗话》所谓“尚意兴”之唐音与“尚理”之宋调。

唐风与宋调的差异,在诗歌史上是一个突出的存在。在一般读者来说,唐诗独尊,无可争议;但自南宋以来,诗学上就有唐、宋诗优劣之争。可见宋诗纵不如唐诗,也还有与唐诗一争高低的资格,所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蒋士铨《辩诗》),唐、宋诗确有可以并称的理由。而且“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自宋以来,历元、明、清,人才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轸域”(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所以唐宋诗之异同,不仅关系唐诗、宋诗本身的理解,同时是了解中国古代诗史一大门径。现在,我们把这两代诗歌,包括五代与辽、金之什,选为一书,使一般记者见春兰秋菊,各

擅其胜,也试为学者斟酌唐宋诗之成就特点和研究中国诗歌史的参考,并述其兴衰流变之迹如下。

在所谓“文章道弊五百年”(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之后,唐诗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唐朝的建立者目睹了隋朝的覆亡,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太宗以后,宫中虽几易其主,但太宗的一些政策措施基本上延续下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长期积累,至开元年间。唐朝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开元之治”。这一时期长达十余年,史书常将开元与天宝并称,誉为“盛唐”。唐朝中期,虽然经过了“安史之乱”的破坏,但唐朝经济在某些地区仍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尤其是未遭战乱的南方,经济发展更为明显。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交通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不仅为诗人们的生活和写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丰富了诗人们的生活,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内容,也使唐诗的传播变得较为容易。另外,唐承隋制,仍以科举取士,而科举考试的项目之一即是诗赋。于是苦攻诗赋,便成为唐代一般文人进入仕途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重视诗赋的社会风气。同时,各门艺术的发展,对诗歌的兴盛也起了重要作用,如音乐、舞蹈的发展使唐诗扩大了题材范围,并获得了新的节奏感。李唐王朝对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对儒道释兼收并蓄,这又大大活跃了思想界,促进了文学、艺术各个流派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以及唐朝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响。这一切为唐诗的发展、兴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加之,唐代诗人认真总结了前代诗人的创作经验,并经过自己艰苦的创作实践,终于使诗歌这一文体形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为了论述的方便,人们一般把唐诗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618—712年)、盛唐(713—762年)、中唐(763—826年)、晚唐(827—906年)。

唐太宗统一全国后，文物典章基本上继承陈、隋旧制，一些隋朝遗老也被收罗进宫，他们的文风自然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有所改变，因此初唐诗坛上仍然弥漫着陈、隋宫体诗的余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虞世南和上官仪。他们的诗喜堆砌辞藻，讲究柔婉的媚态，思想感情都苍白无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官仪对诗歌体制有独到的研究，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将六朝时已具雏形的对法系统化、程式化，对唐代律诗的形成，具有一定作用。武后时代出现了号称“文章四友”的宫廷诗人李峤、苏味道、崔融和杜审言。杜审言创作了一些较为自然清新的律诗，在四人中成就最高，他还写作了一些长篇的排律，对后人如杜甫、白居易都很有影响。武后时还出现了沈期、宋之问，他们对诗歌发展的主要贡献是总结了齐梁以来格律诗创作的经验，并亲自实践，创作了许多完整的五、七言律诗，促成了律诗的最后定型，这对唐朝诗歌的繁荣有重要意义。沈、宋之人品虽为后人所诟病，但其于诗歌之发展则功不可没。

在初唐诗坛上，也出现了一股力图突破宫体诗影响的潮流，其突出代表是王绩和“四杰”。王绩着意向陶渊明学习，他的诗比较清新自然，洗去了宫体诗的脂粉气息；“四杰”指高宗与武后初年“以文章齐名天下”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才华横溢，但在仕途上却屡受挫折，因此能较广泛地接触社会现实。他们借诗歌来表现胸中的郁愤之气，这便决定了他们不愿受齐梁文风的束缚。他们的诗歌题材广泛，文风也比较活泼刚健。他们反对宫体诗的过分雕琢，却并不排斥律诗，反而写作了许多律诗名篇。“四杰”的七言歌行也很有特色，对李白、岑参等人的歌行乐府有直接影响。“四杰”之后，出现了更加坚决反对齐梁诗风的文学家陈子昂。陈子昂树立起文学革新的旗帜，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精神。他的诗一洗齐梁余习，语言雄浑有力，感情自然真实，是初唐与盛唐之间的一座桥梁。

盛唐诗坛天才云集,是唐诗发展的高峰。后人从题材与风格方面着眼,将李白、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分为“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前者的主要代表是王维、孟浩然,后者的主要代表是高适、岑参、王昌龄。当然诗人作品的题材往是多方面的,风格也会有所变化和发展,所以所谓流派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高适擅长歌行和古诗,边塞诗题材广泛,风格慷慨豪迈,具有自然朴素的艺术特点。岑参诗格调高昂,色彩瑰丽,尤善描写边塞风光和边塞生活;各体兼工,尤以七言歌行最为擅长。王昌龄被后人称为“七绝圣手”,在七绝这一诗体的发展上有特殊贡献。其诗内容丰富,尤长于描写边塞军旅、宫怨闺情,意境浑厚含蓄,语言圆润流畅。王维诗尤以山水田园之作最为著名,各体诗中尤以五、七言诗造诣最高。孟浩然的自然浑成,意境高远,语言凝炼,长于五古和五律,追求艺术的完整和精美,在当时颇有影响。盛唐诗人中,王翰、王之涣、常建、祖咏、裴迪等人也有佳篇传世,他们的作品在盛唐诗坛放出了奇光异彩。

当然,在盛唐诗坛最为著名的诗人还是李白与杜甫,他们犹如两颗灿烂的巨星,闪烁在中国诗歌的长空中。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内容十分丰富,感情极为强烈,形象雄伟阔大,语言清新自然,多用比兴、夸张的艺术手法,形成了豪放纵逸的艺术风格。在各种体裁中,李白均有佳作,尤以七言古诗、乐府歌行和绝句成就最为突出,名篇亦最多。杜甫诗题材特别广泛,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承继前贤,勤于探索,刻意求工,无体不精,尤其是七言律诗,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李白、杜甫的光辉成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大历初到大中初的八十余年,称为中唐。此期前十余年,由于安史之乱,社会生活受到很大破坏,人们的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这个时期的诗人往往采取与社会拉开距离的人生态度,较多

地描写自然景色和个人的日常生活,而悯乱伤时的情绪亦贯串其中。大历诗坛的主要诗人有钱起、郎士元、李端、韦应物、司空曙、李益等,而以韦应物和李益成就最高。韦应物诗多写田园风光,具有清雅幽深、含蓄简远的特点,后世与柳宗元并称。李益诗以边塞之作最为人们所赞赏,这一类诗往往表现出气势雄健、境界开阔的艺术风格。在艺术形式上,尤以七绝见长,被后人评为“中唐第一”。

德宗到穆宗的四十余年间,中唐诗坛一度复兴,尤以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年)最为兴盛,形成两个诗派。一派以白居易为首,重要作者有元稹、张籍、王建等人,这一派诗人高举“新乐府”的旗帜,步杜甫的后尘,大胆反映社会现实,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通俗流畅,“务言人所共欲言”。白居易是唐代杰出的诗人,其诗境界开阔,能以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题材,尤其是《新乐府》、《秦中吟》均为指陈时弊、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之作。其他如《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亦有很高的成就。元稹与白居易诗风相近,世称“元白”。张籍和王建最擅长的是乐府诗,世称“张王乐府”,突出特点是语言凝炼,通俗自然而又平易流畅。另一派以韩愈为首,主要成员有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他们向杜甫学习,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有创造性精神,形成了追求奇异、刻苦推敲的诗风。韩愈的诗力求新奇,长篇歌行“以文为诗”,表现出雄豪奇崛的特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卑弱诗风,而且对后代许多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孟郊诗多感伤自己的遭遇,苦思力锤,形成一种硬语盘空、拗折险僻的特色。贾岛诗喜写荒凉孤寂之境,以穷愁苦吟著称。其诗具有清峭幽僻的艺术风格。卢仝诗自成一体,以怪涩粗豪著称。李贺一生以全力为诗,其诗多感时伤逝之作,在艺术上务为新奇,想像丰富,词采瑰丽,极富浪漫主义气息。在这一诗派中,李贺诗的意境与语言最具特色。

在韩、白两派之外,柳宗元和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重要诗人。

柳宗元诗明净简峭,清峻沉郁,以山水诗见长;刘禹锡诗简练沉着,怀古之作最有韵致。尤工绝句,后人认为可追王昌龄和李白。特别是他受到民歌的影响,写作了《竹枝词》等清新朗润、韵致悠扬的佳作,创造出一种新体裁,后人虽多有仿作,但均不能“掩出其上”。

从中大到唐末的五十多年,称为晚唐。此期社会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帝国已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路。晚唐前期最杰出的诗人是世称“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他们二人都向往唐代盛世,有“欲回天地”的志向,诗中多感慨时事、抒发怀抱之作,艺术上亦各有特色。杜牧诗感情充沛,俊爽圆纯,在晚唐浮浅轻靡的诗风之外自具面目;长于律绝和五古,尤以绝句最有特色。其绝句情致俊爽,风调流利,意境深远,堪称晚唐一大家。李商隐以爱情和咏史诗见长,各体均有佳作,尤其是七律最为著名。他在杜甫之后,又在七律这一诗体中开拓出新的境界。他的律诗意境朦胧,构思细密,讲究典故与辞藻,具有独特的风貌。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其诗辞藻华丽,色彩明艳,给人以绮错婉媚之感。晚唐后期也出现了不少诗人,但是成就不高。有一些诗人学习杜甫、白居易,以清新自然、通俗流畅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描绘战乱景象,表达对人民的同情,代表诗人有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罗隐、于鹄等;另有一些诗人多写艳诗,伤悼离乱,情致缠绵,风格柔婉,代表诗人有司空图、韩偓、韦庄等,其中韩偓七律受李商隐影响很大,大多哀婉动人,绝句托兴深远,色彩新鲜,有一些清新可诵之作。

唐亡之后,是五代十国的乱世。当时中原“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新五代史·序》),“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礼崩乐坏……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论》)。这个旧来传统遭受巨大破坏的时期,给了晚唐以来文人就已染指的词的兴起以绝好的机会,从而文人较少措意于诗歌,即有作者也不不过在晚唐风习的笼罩下徘徊,成就略无可称述。正如五

代的乱世被有人看作是赵宋王朝的统一的历史的序幕,这一时期诗坛的萧条也是在等待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为其提供发展和变革的动力。

公元九六〇年宋朝的建立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新变和又一次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这不仅指它结束了五代分裂混乱的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又能较为正常地进行,从而为文学包括诗歌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而且是说宋朝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比较唐代也有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宋太祖以兵变得国,又愆于唐末藩镇割据之害,政治上忌防武人而注重文治,比较倚重和优待文人,从而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使有宋一代诗人辈出。据有关统计,宋代有诗人一万一千多人,存诗二十余万首(郭预衡《中国文学史长篇》)。这个数字高出唐诗四五倍。同时作家也是高产的,“少者千言,多者万首”(刘克庄《竹溪诗序》),亦前代之所无。其次,宋朝外患严重,积贫积弱,在加重人民负担激起反抗的同时,也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党争不已。当时诗人,特别许多高官兼政治家的诗人,置身局内,往往比前代作家更具社会的责任心和政治的敏感,而集中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范仲淹所谓“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是有宋一代作家思想的主流。这决定了宋代的诗歌多时事诗,政治诗,能及时而尖锐地表现政治斗争,广泛而深入地反映社会矛盾与民生疾苦,特别南渡以后突出了爱国主题,形成爱国主义诗歌的潮流。第三,宋代又是学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特别是儒学复兴、礼教重整并最终导致新儒学——理学出现,加以科举考试改重经义策论的刺激,也引导和助长了诗歌向学者化与议事、议政甚至说理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以“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这成为宋诗评价中一个有争议的特点。第四,宋朝国土比较汉唐缩小了许多,又内忧外患严重,更加以“文字之祸亦他代之所无”(王世贞《居易录》),压迫文人少了许多外在的自由,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重体验、重内省的深思的一代,养成量情体物的缜密深细的态度。故宋诗一面几乎无事不可入诗,无意不可入诗,又每能曲折新异,刻抉入理,求细、求透、求活、求精,形成内敛深沉的特点,人称“宋调”。第五,唐诗的榜样,特别是杜甫、韩愈、白居易及贾岛、姚合等人的诗,启发了“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钱钟书《宋诗选注·序》)。总之,宋人当唐诗高峰之后,穷则思变,刻意为诗,虽未能后来居上,但是一代诗人的努力,仍然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宋诗的发展有北、南宋两大阶段,具体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北宋初期(960—1021年)、北宋中期(1022—1062年)、北宋后期(1063—1100年)、北南之际(1101—1162年)、南宋中期(1163—1207年)、南宋后期(1208—1279年)。

北宋初期的六十年间,诗坛尚沿袭唐风,相继出现的主要有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白体诗人宗白居易,主要作者有李方、徐铉、王禹偁等。他们作诗务求平易浅俗,其佳作流丽清新、平淡自然,但多半“流易有馀而深警不足”。李、徐都是由五代入宋的高官和著名文人,因其地位,使白体在当时影响很大。但白体诗人中最有成就的是王禹偁。其诗有白体之浅切明畅,又自格高意远,清而不俗,论者称其“独开有宋风气之先,而后欧公得以承流而接响”(吴之振《宋诗钞》)。稍后于白体流行的是晚唐体,主要作者有林逋、魏野、寇准及所谓“九僧”等。他们除寇准是高官外,大多为隐士和僧人。其诗欲矫白体之俗,乃以贾岛、姚合为宗,作风清苦,刻意锻炼,务求幽峭出奇,时有精巧的构思和清雅超俗的意境,但往往小巧破碎、单调乏味。西昆体以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主要作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这些人都是馆阁重臣和饱学之士,作诗专学李商隐,但是缺乏李商隐的情怀气格,偏于以才学为诗,好用典故,喜尚辞采,组织富丽精工,其咏史、交游赠别之类题材作品有一些较好的诗篇,而风格却是太贵族化了,并且大都意义浅

薄,晦涩难懂。不过,西昆体的出现对救正白体及晚唐体之弊有一定作用,“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去”(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北宋中期的四十余年即仁宗朝,是整个宋代的全盛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都在这一期达到繁荣或变革出新。当时伴随儒学复兴而来的文学复古运动,有力地冲击着诗坛机械模拟唐人的风气,并孕育形成了宋诗独特的风貌。在所谓“宋调”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作者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其中欧阳修是集诗人、学者、重臣为一身的人物,他不仅以自己的诗歌和诗论影响一代,而且团结支持了梅、苏等,为创建“宋调”的实际的领袖;同时他还提携了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为下一阶段宋诗的高峰作了人才的准备。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高者当推梅尧臣。他的诗多能反映重大现实问题,关心民生疾苦,对于宋初诗歌从偏重辞藻和形式的西昆体中解放出来起了积极作用。梅尧臣诗歌注重题材的开拓,最喜以别人未写过的题材入诗,在描写琐碎平常的生活题材中寄含哲理。又为诗精苦,学韩愈,诗风有古硬雄健的一面;而更为自觉地追求古朴平淡,由此形成他突出个人特色。当时苏舜钦与梅尧臣并称“梅苏”,梅诗以“古淡”名世,苏诗以“豪放”著称,意新语奇,热情奔放,气象开阔,但有时失之于率意。石延年是比欧阳修和梅、苏更早而较有成就的一位诗人,其诗气横意举,为欧阳及梅、苏等所激赏,可惜作品存世甚少。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几位重要诗人已经共同地显露了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倾向,这当然有唐诗影响的因素,但在整体上乃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新异而颇受争议的特点。理学诗派的形成也是这一时期诗坛引人注目的现象,邵雍堪称这一派诗人的代表;此外,范仲淹、韩琦、司马光等一批名臣也都有优秀的诗作,成为欧阳修等人诗歌复古运动的重要辅翼和补充。

北宋后期,从仁宗朝就已积聚起来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社会的动荡、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及由此而起的党